



# 英勇无畏的革命烈士——苟永贵

苟永贵(1907—1940),男,汉族,宁夏彭阳县孟塬乡人。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苟永贵听到红军买卖公平、体恤穷人、斗争地主的消息,心中便燃起了热切的向往。时隔一年,西征红军来到苟永贵的家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扩建革命根据地,唤醒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苟永贵亲眼看到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穷苦乡亲翻身闹革命的热烈场面,尤其是红军宣传一致抗日、救民救国的革命道理,使他备受鼓舞。现实的改变,革命思想的熏陶,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百姓的靠山。从此,他怀着跟共产党走的坚定决心,积极投身革命。

1937年1月,红军地方工作队到孟塬何家峁组建了抗敌后援会,苟永贵与穷苦乡亲一同热情帮助红军做地方工作,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募捐支前,中共草庙区委认为苟永贵革命积极性高,秉性耿直,办事公道,忠实可靠,秘密接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苟永贵入党后,激动不已,革命热情倍增。他和中共何家峁党支部书记王富周一起积极从事地下党的工作,暗中将史秉义、杨占仓等五人介绍入党,使党的地下工作在何家峁一带秘密开展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开往前线。国民党张廷杰自卫队盘踞环县车道、毛井一带,卢业广自卫队据守

小岔、冯庄等地,他们改变了伪善态度,开始注意并搜捕后援会的人员,瓦解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伺机反扑。同年冬季的一天,苟永贵接到区委通知,让他夜里前往镇原县马渠乡高家塬头高占仓家开会。因泄密,被卢业广的自卫队探知,卢即派人奔赴高家塬头抓捕,党组织察觉后,来不及改变开会日期。对此,苟永贵全然不知,到开会地点后,他发觉情况异常,欲转身转移,但为时已晚,不幸被捕。自卫队的人得意忘形,对苟永贵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连夜拉到孟塬乡雅石岔惠荣和家,等待天亮了解情况。苟永贵知事败露,便抱定了为党和人民事业一死的决心,面对自卫队的残暴,缄口不语,横眉冷对。夜间,惠家兄弟出于同情,待自卫队的人睡熟后,偷偷将苟永贵放走。他们估计苟永贵已跑远,假惊叫:“苟永贵跑啦!”自卫队的人突然听到喊声,待从梦中惊醒,人已走空,便将惠家兄弟打骂一通,只好作罢。苟永贵逃出后,藏到他家庄前沟中的窖子里。生死攸关之时,在窖子的墙上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表明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窖子好比神仙洞,个人来人都致命,杀了苟永贵,还有后来人。”

苟永贵脱离虎口后,深知当地不能久留,撇下妻儿老小,进入三岔解放区,被中共三岔区委任命为第三乡乡长。这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围攻、封锁,经济十分困难。因此,党组织抽调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参加经济工作,苟永贵被调任三岔区

粮库主任,兼任三岔区委委员。

1940年前后,国民党杨德亮部队进攻解放区。卢建祥(卢业广之子)自卫队乘机反扑边区,挖“红”根,断“红”苗,制造反革命白色恐怖。党组织为保护党的骨干,分批转移在国统区已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赴延安培训学习,以避锋芒。本年冬,苟永贵前往延安学习前,回家探亲,在与乡亲交谈中,偶然听到驻扎在庙湾的曲子县三岔区第二乡农民自卫军中,一部分人受国民党团总白玉堂和张廷杰自卫队反共煽动的影响,情绪低落,有哗变的可能。他本来可一走了之,但作为区委的领导人,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前往庙湾协助樊富银副营长检查整顿自卫队。当夜,密谋叛变的自卫队长张克奎、白治武等11人,发觉事将败露,提前行动,包围了区委,杀害了樊营长,绑架了苟永贵和区文教助理员何进明、建设助理员石有光、二乡乡长虎殿之,欲作投敌献功的见面礼。叛变的自卫军在出逃投敌的路上,各人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去投卢建祥,有的坚持要投降张廷杰,还有的嚷着要去固原干大事。苟永贵走在最后,一位姓白的看押队员良心尚未泯灭,趁别人不注意,推了张廷杰和卢建祥你就不得活了。”

来不及去解开绳索,就将苟永贵放掉。黑夜中,张克奎等人并未发觉。白某见他已跑远,有意大声喊叫:“苟永贵找不着啦!”边喊边追。张克奎见状,即派白治武、白怀礼二人追寻。二人接到命令,手持凶械,紧追不放。这天夜里,天下了一场小雪,苟永贵赤脚跑过的脚印,正好给叛兵寻找留下了线索,第二天上午,苟永贵跑到小岔乡耳城村佛道岔羊圈坡时,由于坡陡路滑,不慎滑倒,滚下山脚的乱石中,因双手反绑,一时不能起立,延误了逃脱的时机,被白怀礼二人追上。苟永贵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大义凛然,痛斥他们叛变的可耻行径。恼羞成怒的白怀礼二人用马刀和长矛在苟永贵的头上乱砍乱戳,白怀礼残忍地向苟永贵的头部砍去一刀,苟永贵额头一大片皮肉被削落,下垂盖住了双眼,血流满面,惨不忍睹。但苟永贵坚强不屈,视死如归,仍骂骂不绝。最后,白治武用长矛刺准苟的咽喉,苟永贵全身受伤11处,倒在血泊之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

苟永贵牺牲后,被抛尸野外。当地一姓张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夜间偷偷地将苟永贵的遗体掩埋。20多天后,家人经陈姓亲戚转告,始得噩耗,几经周折,才将其遗体搬回安葬。

1960年苟永贵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 扭转西北战局的沙家店战役

沙家店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战斗,曾有学者评价: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是解放战争时期陕北战场的转折点,更是我西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

1947年3月,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最高长官胡宗南命令所部精锐23万人进犯陕北,妄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我西北解放军采用运动战,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并乘胜包围了塞上重镇榆林。

胡宗南见状,急命国民党整编36师组成“快速兵团”赶赴榆林救援。国民党36师是胡宗南的王牌,其师长钟松是黄埔二期生,“最喜欢擅自发挥”,曾鼓吹要“一战结束陕

北问题”。在受命援救榆林时,钟松深知胡宗南身边潜伏有中共谍报人员,于是他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出长城,沿着沙漠行军,从而避过了我西北野战军主力的伏击区,快速抵达榆林城南郊。

我军虽未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西北国民党军的战略目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摆出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势。胡宗南果然上当,他认为共军正在“仓皇逃窜”,命令各军要“迅猛追击”“勿失千载良机”。国民党36师经过长途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但第二天就接到胡宗南“迅速南下”的命令。虽然师长钟松认为部队非常疲惫,建议暂缓,但被拒绝。当时36师苦无粮食,只得临时向榆林的银行借钱买粮。胡宗南答应立即从西安运来补给。于是钟松把部队的运输队和辎

重队全部留在榆林等待补给,自己带着师部直属部队和第123旅、165旅的四个团轻装追击。不过,辎重队只是等来了一个大饼,而且由于天气炎热,不少大饼还发了霉。幸亏钟松指挥部队在镇川堡抢得了一部分老百姓还没来得及及运走的粮食,才解了燃眉之急。

见钟松孤军深入,彭德怀集中了西北野战军8个旅的部队,在沙家店设伏,于8月18日发布了“以伏击姿态歼灭该地36师”的命令。

8月18日上午,国民党36师“前梯队”123旅和我西北野战军3纵交叉,打响沙家店战役第一枪。我军且战且退,于黄昏时诱敌至乌龙铺北山。这时,钟松发现沙家店附近有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遂急令“前梯队”向沙家店靠拢。但123旅旅长刘子奇怕部队深夜移动会遭到伏击,仅令一个团先行驰援。这样,国民党36师被

我军分割成两部分。

8月20日拂晓,彭德怀下达了总攻令。上午10时,国民党“前梯队”123旅进至常家高山附近与我军激战。刘子奇命令山炮营开炮,却发现12门山炮中只有3门还在军中,且炮弹只有40发,其他的山炮全部被留在行军路上了。截至14时,我军全歼该敌,刘子奇也被我军俘虏。

20日午后,我参战部队在沙家店向敌全线猛攻。截至18时,我军毙伤、俘虏敌6017人,钟松与165旅旅长李日基化装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又在彭德怀陪同下,视察了战场。视察后毛泽东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性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据人民政协网)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成功探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启了一种全新样式的民主政治探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便是创立最早、形态最完备、最具典型性的民主制度。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1941年11月6日至21日、1944年12月4日至19日、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先后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一次、第二届第二次、第三届参议会共4次大会,为边区各社会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少数民族进行合法政治参与,反映各自利益诉求和表达各种政见提供了重要渠道,还成为其他根据地政权建设学习和效法的样板。

### 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探索形成了兼具民意表达与权力运行的民主政治模式,不仅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更开辟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在组织架构、政权建设、议程设置上搭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组织架构方面形成了以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完整民意机关体系。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要建立完善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其职权包括立法、选举政府成员、审议财政预算等。1941年11月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1946年4月,边

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首次在法理上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形成乡级直选产生基层政权、县级整合区域利益、边区级统筹立法决策,构成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民主闭环。

明确政权建设“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政治和团结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因时势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在实行这一政策后,第二届参议会的党派成分发生很大变化。1941年11月,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共产党员123人,国民党员24人,救国会派1人,居住边区的东方民族(日、韩、印度、荷印)及少数民族代表10人,其他非党人士61人。“三三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极大地利于反映边区各阶层人民的诉求,提高政权的民意凝聚力。

议程设置上,参议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涵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法规制定、提案讨论、选举等环节。提案数量多、质量高、涉及面广,反映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对提案办理工作也认真负责,毛泽东等领导人还亲临参议会发表重要讲话,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风气。

### 边区治理成效的充分彰显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领导的重要民主政权组织形式,其历史作用不仅体现在推动边区

建设与抗战胜利中,还在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和制度雏形。

首先,团结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边区参议会通过吸纳开明士绅李鼎铭、安文钦、贺连城等,还有少数民族人士马生福阿訇(回族)、鲜维俊(回族)等,使得边区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开明士绅及少数民族的加入不仅提高了边区政权的号召力,还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

其次,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成功推进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人士提出各项议案积极为边区建设建言献策,抗日民族政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大大提高。参议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动边区群众协商解决实际问题,做到既议又决,并对工作和干部进行检查监督,体现了践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管理公共事务的价值取向。

再次,从战时民主到全国性民主,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石。一方面,参议会作为民主试验田,其代议制民主、立法与监督职能、民主集中制原则、多党合作、群众路线等特质,直接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吸收并加以制度化。1946年4月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一方面,党外民主人士凭借参议会,参与到边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形成由“共产党主导”和“多党派参

与”的政权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提供了借鉴。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积累的经验

参议会在政权构成上严格执行“三三制”,确保了重大决策的正确方向。同时在议事规则方面确立“民主集中制”,既保障议员“知无不言”的议政权利,又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实现政治意志的统一,为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边区参议会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扬民主,但始终没有放弃和动摇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地位。这提供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根本遵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始终是人民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其二,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边区参议会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吸纳不同意见和建议,平等友好地与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行政治协商,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三,始终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优良作风保障。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参议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完善的重要原则。其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历史经验。(据《学习时报》)

## 解放战争时期宁夏党组织的主要活动情况

1945年4月,三边地委根据上级加强外部工作指示的精神和宁夏人民被马鸿逵苛政所迫逃到三边避难者不断增多的情况,对宁夏工作进行了检查讨论。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以建党为中心,走农村改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以赵文献(地委常委、专署保安处处长)、梁大均、何广宽三人组成河东工作组,由赵文献任组长,梁大均任副组长。工作组下设余庄子工和红井子两个据点,分别由梁大均和何广宽负责(这两个据点,以后升为两个工委: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副书记李健;红井子工委,书记何广宽)。

1945年12月和1946年2月,地委对宁夏工作进行了两次检查。半年多来,余庄子、红井子两个据点和三段地的工作都发展很快,并在4个党员的基础上发展到130余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便于工作及领导,西北局于1947年1月17日讨论了宁(夏)绥(远)工作,决定将原来的宁夏工委与伊盟工委合并为宁夏工委,并以朱敏为书记,赵志国为副书记,日常生活仍与三边地委一起,对外亦仍以三边地委统战战形式出现。三边地委在政治上及干部等具体问题上,多次给宁夏工委以帮助。

开展宁马(鸿逵)军队的工工作,是宁夏工作的中心。对马鸿逵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他,其目的是让他中立。这个方针,就是在他向我们进攻时亦应坚持不变,因为我们的自卫反击,也还是为了争取他。

关于党的组织,仍应继续发展,在发展中去提高、去巩固。因此,党员教育应加强,特别要教育新党员为何工作及如何活动。至于统战工作,应由广到深。对已有的关系,工委应一个一个研究,根据个人的情况布置工作,并利用一切关系,广为结交,建立新的关系。

扩大回汉支队(1947年1月,经西北局批准,将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回民支队三支武装合并成立回汉支队。三边地委确定,这支地方武装在政治上属宁夏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领导),培养宁夏本地干部,工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部训练队,连续不断地抽调与培养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宁夏去工作。同时,回汉支队也应准备将来到宁夏去活动,因此决定该支队归工委领导(供给由三边军分区统一筹划),并由赵志国、梁大均分任正副司令。

为了加强对宁夏工作的指导,1948年8月31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西北局决定以赵志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云、王志强等八位同志为宁夏工委委员,并以赵志国为书记,孙璞为第一副书记(孙璞同志盐池县委书记兼任原职仍保留名义,盐池工作由副书记郭文举、副县长兼襄和负责),梁大均为第二副书记仍兼回汉支队政委。梁东岳为回汉支队副政委。三边地委决定将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增加为宁夏工委委员。

宁夏工委于9月21日至26日,在盐池五区的唐平庄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三边地委书记、原宁夏工委第一书记朱敏专门来参加。会上,朱敏同志首先对义合会议和吴旗会议(指三查)的极左思想做了检讨,接着传达了西北局8月31日的通知和地委9月5日会议的决议。会议联系过去工作的实际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汇报和讨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1949年3月,工委扩大会议检查了半年来的工作。这是一次比较有准备的会议,会议中讨论的问题较深刻。发言人事先都做了准备,对几个重要问题,都有中心发言人。建党与群众工作由李健发言,宣传教育与统战工作由何广宽发言,外情工作和调查工作由张广珍发言。会议认为,这半年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自1948年9月唐平庄会议,截至1949年2月底,除三段地的情况尚未报外,已恢复外部的旧关系100人(内有党员39人,非党员61

人)。经过训练,派出12人(内有党员7人,非党员5人)。在外部共有新旧力量173人(内有党员54人,非党员119人)。

部分地方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据点。在党内,有灵武县第八乡磁窑堡张子英的炭工小组;金积县三乡间生明的农民小组;灵武县八乡三保李成福的农民小组。群众工作据点,有李成福领导的以庙会形式组织的群众小组,灵武县十三乡王守忠(该乡民政主任)、倪正(小学教员)郝汉杰(保书记)、郭英(曾任过乡长)等四人;灵武县六乡王守忠(该乡民政主任)、倪正(小学教员)郝汉杰(保书记)、郭英(曾任过乡长)等四人;大寨子张冠九(中学生,曾任该地高小教员)等三人;贺兰县水利局长李生春等两人;叶盛堡教育界人士冯俊和、李光成、刘万福等;吴忠的李生荣(哥老会成员,曾当过马鸿逵的便衣人员)等四人;惠安堡的李全(摆小摊)等三人各建立情报点。

自宁夏工委1949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后,五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全国、西北的形势发展很快。7月下旬,彭总率西北野战军向西北的军事重镇兰州进军。这时,宁夏工委在盐池县五区的西湾召开会议,检查了前几个月的工作,并决定派梁大均和冯浪等前往固原,随六十四军的独一师和独二师收复三边区,驻军下马关。三边的收复,预示着宁夏解放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了。现在积极进行接管宁夏的准备工工作。

宁夏有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是过去民族斗争激烈的地区之一,过去党在宁夏工作基础薄弱,加之形势迅速发展,干部不足,必须从老区抽调干部。这些干部虽然在老区工作经验丰富,但缺乏对新区的知识和工作经验。故在宁夏解放之前,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应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研究干部思想,进行新区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将来才能有组织地、有秩序地进行接管,迅速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

为此,对解放后的工作,研究提出了对敌党政军机构及人员的处理建议:宣布解散。特务分子必须限期登记,并令其缴出一切特务证件、文件、电台、武器及其领导下的全部名单,首要特务分子予以管押待处理。一般敌党员可不必登记。这些工作统一由保安机关执行,严禁滥捕。废除敌币。一般敌收照章征收,较明显的苛捐杂税待查清后,再逐渐废除其确属苛杂部分。坚决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宁夏城及三盛公之外侨,在其遵守法令的原则下,保护其生命财产。如有特务间谍破坏行为,必须依法惩办,但除现行犯外,必须呈请上级核准后才能逮捕。我们的工作,未经批准不得随便接见外国人与发表言论等。共十三条。

三边地委和宁夏工委于1949年9月上旬,决定派韩效忠去独一师黄罗斌处,准备任同心县委书记。

9月中旬,宁夏工委全体人员由定边出发赴宁,并组织了四个工作队(实际上是准备解放后的四个县的领导班子)。第一队是金积队,队长何广宽(县委书记),副队长陈维光(县长);第二队是灵武队,队长李健(县委书记),副队长冯茂(副县长兼吴忠市长,县长丁奇未到);第三队是中卫队,队长李子奇(县委书记);第四队是中卫队,队长杨正喜(县委书记),县长准备由路思坦担任,因路思坦在前线领导担架队,随军工作而未未来。总的由赵志国、孙璞率领,经惠安堡、石沟驿,于9月19日到达吴忠,与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接头。23日银川解放。24日,除四个队分赴各县外,宁夏工委的全体人员进入银川,从此结束了宁夏工委的历史使命。(据《宁夏文史资料》)